

索罗金和他的元曲论

李明滨

俄国汉学家索罗金在七十年代以发表《十三、四世纪的中国戏曲》一书而成为俄国和前苏联最有名的元曲研究家,同时也引起我国同行学者的注意。

元曲在俄苏的翻译与研究

“凡是在上个世纪或者前不久到过中国,而且将其见闻形诸文字的欧洲人,恐怕不会有人不提到那些令中国人男女老少皆喜爱的戏曲——马可·勃罗是第一个报导他在元代忽必烈皇帝酒宴上看到一群用各种乐器演唱以欢娱宾客的表演,那显然……就是一出元代杂剧。”索罗金在他专著的开头这样描述道。

诚然,元代戏曲不但在欧洲,而且在俄国早有流传。在 18 世纪(1731 年)元代杂剧《赵氏孤儿》被法国来华的传教士马若瑟译成法文,成为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剧本。俄国人涅恰耶夫于 1788 年将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根据该故事情节创作的剧本《中国孤儿》译成俄文。在此之前,俄国剧作家功马罗科夫于 1959 年已从德文翻译了《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这些都向俄国人传达了元曲的信息。

刊于《中国文化研究》1996 年第 1 期 ② 吴光:《儒家文化的结构、特征、精神及其发展前景探讨》,刊于《浙江社会科学》1996 年第 3 期 ③ 赵景来:《论 21 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刊于《天津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 ④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刊于美国《国际事务》1993 年夏季号,中译本载于香港《二十一世纪中国》1995 年 10 月号 ⑤ 陈光金:《儒家传统与现代化》,刊于《求索》1995 年第 6 期 ⑥ 蒙培元:《换一个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刊于《亚文》1996 年第一辑 ⑦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 页 ⑧ 渡边浩:《进步与中华》,刊于《近代化像》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 年版 ⑨ 张立文:《21 世纪文化战略构想——和合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 11 月版 ⑩《论语·学而篇》,《论语·子路篇》 ⑪《幼官》,《管子集校》第八 ⑫《乾·彖传》 ⑬竹中

靖一:《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シネルグワ书房,1973 年版,第 381 页 ⑭《进圣学十图扎》,《增补退溪全书》(第一册),第 198 页上 ⑮同⑭⑯《陈时事疏》,《栗谷全书》卷七 ⑰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66 年版 ⑱崔志鹰、黎漪:《试论儒教文化对韩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刊于《学术季刊》1995 年 4 期 ⑲山口定:《朝日新闻》1994 年 10 月 30 日载文《关于“共生”》 ⑳李平:《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 章 3 节 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5 章 4 节 ㉑沟口雄三:《写于“亚文”发刊之际》,刊于《亚文》1996 年第 1 辑 ㉒小川晴久:《实学和哲学》,刊于《第四回东洋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 340 页 ㉓张立文:《东亚意识何以可能》,刊于《亚文》1996 年第 1 辑。

但俄国出现最早的评介文字则在 19 世纪,1892 年《雅典娜神庙》杂志 6 月第 11 期发表的短文《学者之女雪恨记》,介绍了《窦娥冤》的剧情和《元夜留鞋记》的故事梗概。第一篇俄译的中国戏曲剧本是《樊素,或善骗的使女》,载 1839 年《读书丛刊》第 35 卷,作者题名郑德辉。经俄国汉学家李福清查对,那就是郑光祖的《信梅香》,译为巴依巴科夫。后来,1847 年在彼得堡有人由法文转译了高则诚的《琵琶记》,出版单行本。

对元曲首次作全面介绍的功劳应当归于俄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1818—1900)他出生于俄国下新城,1837 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东方语言科,1840 年来华留学,居留北京十年。1851 年起先后在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担任教授,执教 50 年,著译丰硕。主要著作之一为《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该书辟有专节论述中国戏曲和小说,除了综合性的介绍,还有一些精辟的论断。在追溯中国戏曲和小说的历史时,较早提出“戏曲是从印度传来的”,“小说由传说到中篇,由中篇到长篇的发展,其源头可能也是外来的”等观点,同时又指出,“但是另一方面,无论在戏剧和小说的领域里,中国人都不是单纯的模仿者。这是一个一贯保持着独立自主精神的民族,对一切异邦和外来的东西,她都以自己的眼光加以检验,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改造——因此,戏剧和小说总是显露出中国的精神,表达着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瓦西里耶夫特别推崇《西厢记》,认为“如此完美的剧本,在欧洲也不多见”。作者特地把《西厢记》编成故事梗概编入书籍,以供读者了解。

苏联时期的研究文字就更多了。重要的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文章《中国历史上的优伶英雄》(《中国文学》文集 1978)。比较集中的是 1958 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中出现的一系列纪念关汉卿创作七百周年的著述:费德林的小册子《关汉卿——伟大的中国剧作家》,艾德林的文章《关汉卿》(《文学报》1958 年 6 月 19 日),索罗金的文章《伟大的剧作家关汉卿》(《苏联文学》1958 年第 2 期)。还有早些时候谢曼诺夫的文章《论关汉卿剧作的特色》(《东方学问题》1960 年第 4 期)。东方学家康拉德也有若干论述(见《文著选·中国学》,1977)。也是在这个纪念活动中,发表了直接译自关汉卿中文原作的两种俄译,一是《窦娥冤》,索罗金译并序,载《外国文学》1958 年第 9 期;一是《救风尘》,谢曼诺夫和雅罗斯拉夫采夫译,见《东方文集》1958 年第 2 集。两种均为节译。

俄国汉学家孟列夫写的专著《中国古典戏曲的改革》(1959)主要谈中国解放后的戏曲改革,但书中也涉及古典戏曲,如杨显之的《临江驿潇湘夜雨》等元剧。孟列夫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了王实甫的《西厢记》。俄文书名为《西厢记,崔莺莺待月西厢》(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1960 年,共 283 页)。这是根据王季思的校注本,并参考吴晓玲校注本翻译的。译本每折附中国木刻插图一幅,共 20 幅。扉页印木刻的莺莺“双文小像”一幅(木刻图均取自金圣叹批本)。孟列夫用诗体翻译了剧中的曲词,并写了长篇序文《〈西厢记〉及其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序文简述了元曲发展的历史、关汉卿的开拓作用、王实甫的继承与创新。他认为,王实甫把元稹和董解元先后写过的同一题材加以提炼和加工,运用元曲的抒情手段来描述主人公的内心感情,使莺莺的形象达到完美的地步。同时,孟列夫还谈到《西厢记》对于《水浒传》《红楼梦》以及中国民间文学的广泛影响。也提到由剧本改编的越剧(绍兴戏《西厢记》)于 1955 年到苏联演出时的盛况。

1970 年出版的莫斯科大学教材《中世纪的东方文学》有主编波兹涅耶娃教授写的评述元曲专章。她从中国文学也有过“文艺复兴”时期(并确定该时期为 7—12 世纪)这种

观点出发,认为元曲属于“蒙古侵占时期的文学”。因而引起俄国汉学界的争议

另一位女汉学家盖达写的专著《中国的传统戏曲》(1971)描述了从古代至 14世纪中国戏剧艺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它从表演艺术的角度涉及到元曲

论述元曲的文章还有谢列布里亚科夫《论元代剧作家马致远的剧本〈汉宫秋〉》《东方国家语文学》文集,列宁格勒,1963),以及库切拉、齐宾娜、佐格拉芙、李福清等人的论文。

在翻译作品方面,除《西厢记》外,1966年出版的《元曲》俄译本,系由一批列宁格勒的汉学家如司格林、马里诺夫斯卡娅、费什曼、谢列布里亚科夫等合作完成的,由孟列夫编选,彼得罗夫作序,收入十一个著名的元杂剧本: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和《单刀会》,白朴的《墙头马上》和《梧桐雨》,康进之的《李逵负荆》,马致远的《汉宫秋》,李好古的《张生煮海》,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张国宾的《合汗衫》,石君宝的《秋胡戏妻》。1976年出版的“世界文学丛书”《东方古典戏剧》卷(中国戏曲部分由索罗金编选并序,雅罗斯拉夫采夫、戈鲁别夫等参加翻译)也收入《窦娥冤》等四个杂剧。至此译成俄文的元代杂剧已有 14 个,占现存中文作品的十分之一。据索罗金统计比较,用西欧文字翻译的元曲比俄文的译本种类要大两倍多(第 14页),约占现存中文原作的五分之一(第 186页)。

俄国首部论元曲的专著

索罗金著《十三、四世纪中国古典戏曲:起源·结构·形象·情节》(科学出版社,1979年,334页,印数 3500册)一书,不但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著,为作者赢得了声誉,而且是苏联汉学界第一部专论元曲的著作。

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全书设四篇。第一篇“体裁的起源”(第 17—76页),分为“戏剧艺术形成的早期(十世纪以前)”、“十一至十二世纪的歌舞表演和说唱”、“十至十二世纪的戏剧表演”和“诸宫调演唱与‘南剧’”四章。其内容是阐述元杂剧在形成过程中,吸收过诗词、小说及古代散文、民间传说以及戏剧的哪些成份,并论析这些成份在元杂剧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第二篇“杂剧的结构”(第 77—128页)也分为四章,为:“唱段”、“杂剧的曲”、“调,曲的音乐抒情形式”和“杂剧的散文部分”。这一篇主要是论述杂剧唱段的结构和语言特点,通过各时期流传下来的剧本、残本对比,鉴定基本内容和主题思想有多大的变化。

第三篇“元剧的形象世界”不分章(第 129—185页),集中分析元杂剧中出现的主要角色:帝王、文臣、武将、判官与罪犯、逆民与隐士、青年书生、妇女、商人、农民及其他。通过分类和详细的分析,探索杂剧作者的创作意图、美学观念以及杂剧反映时代的程度。

第四篇“十三、四世纪杂剧的剧目”(第 186—296页),分别按每一折戏详细叙述迄今保存的一百六十二部元代杂剧的剧作内容,并列剧中人物表和角色说明。

通观全书,可以发现其资料异常丰富。作者使用过的参考书目达五百多条,他不但仔细研读过现存的每一折戏,而且参阅中国历代论述杂剧的书、文和国外的有关论著。关于戏曲的体裁问题,尽管中国学者王国维、周贻白、赵景深等人已有论述,俄国的另一位戏曲研究者盖达也有对中国戏曲史的若干阐述,索罗金仍然有自己的见解,因而显得与众不同。他综合各家之言,概括自己的成果,提出中国戏曲的产生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它不但有说唱艺术,而且有歌舞、滑稽戏、古典诗歌和小说等多种体裁的创作经验。

索罗金采用对比和对照分析的方法分析元代杂剧的结构,以其四折结构同诗词结构相对照。他认为李白、白居易等诗人常写的绝句,四句是按起、承、转、合安排的。而杂剧的四折结构正好与之相似。即第一折故事开端,第二折趋于复杂化,第三折剧中冲突达到高潮并发生转折,第四折团圆结局。作者解说其分析的依据,认为大多数杂剧的结构都是如此安排的,只有少数例外。即使有例外的情况,也只是在其中的某一折有若干变化,但在总体上遵循这一剧情发展的规律。

作者指出把这种方法运用到中外戏曲的对比分析上,尤其在论述杂剧的特征、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形象时,这样的对比分析更显得鲜明,能给人以启发。他指出,中国和欧洲戏剧的不同点之一是,欧洲的古典戏剧常常表现义务与感情之间的冲突,从而揭示这种冲突的悲剧性和主人公的矛盾心情及其悲剧结果。而元杂剧中则没有这种矛盾冲突,剧中人物都明确自己该如何行动,特别是正面人物总是毫不动摇地按照义务的要求行事。

不过,索罗金又提到,即便是义务的概念,中国与欧洲的作家也绝不相同。欧洲作家的义务观是指上帝,即个人对上帝负责,而中国元杂剧的作家则认为是效忠于君主和国家。可见二者的观念是相异其趣的。虽然从总体上看元杂剧与欧洲戏剧绝不相同,但从个别的、局部的特征上,又有不少共同点。例如元杂剧很接近于欧洲中世纪的奇迹剧、滑稽剧、劝世剧等。就某些方面的特点来看,它类似文艺复兴早期的戏剧,或近似稍后时期的市民戏剧。

索罗金在专著中特别说明:鉴于“大部分元杂剧事实上尚未受到非专门研究元曲的文学评论家,尤其是只关心一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的汉学家的注意”,他特地把现存的一百六十二部元杂剧的剧作,详细编写出情节和内容提要,包括剧中角色的说明等等。这样,不但可以为不能看到元杂剧原作的人提供一个概貌,即包含它的“题材、人物性格、思想以及剧情的时间和地点”等有概括的了解,而且大大扩展汉学家们对“中世纪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在我们看来,它的意义还在这是元曲杂剧首次介绍给俄文读者,因而有必要把他所介绍的杂剧剧目列举出来:

- 1《汉宫秋》,马致远
- 2《金钱记》,乔吉
- 3《陈州粟米》
- 4《鸳鸯被》
- 5《赚蒯通》
- 6《玉镜台》,关汉卿
- 7《杀狗劝夫》
- 8《合汗衫》,张国宾
- 9《谢天香》,关汉卿
- 10《争报恩》
- 11《张天师》,吴昌龄
- 12《救风尘》,关汉卿
- 13《东堂老》,秦简夫
- 14《燕青博鱼》,李文蔚
- 15《潇湘雨》,杨显之
- 16《曲江池》,石君宝
- 17《楚昭公》,郑廷玉
- 18《来生债》,白朴
- 19《薛仁贵》,张国宾
- 20《墙头马上》,白朴
- 21《梧桐雨》,白朴
- 22《老生儿》,武汉臣
- 23《殊砂担》
- 24《虎头牌》,李直夫
- 25《合同文字》
- 26《冻苏秦》
- 27《儿女团圆》,杨文奎(高茂卿)
- 28《玉壶春》,武汉臣(贾仲明)
- 29《铁拐李》,岳伯川
- 30《小尉迟》
- 31《风光好》戴善夫
- 32《秋胡戏妻》,石君宝
- 33《神奴儿》
- 34《荐福碑》,马致远
- 35《谢金吾》
- 36《岳阳楼》,马致远
- 37《蝴蝶梦》,关汉卿
- 38《伍员吹箫》,李寿卿
- 39《勘头巾》,孙仲章
- 40《黑旋风》(双献功),高文秀
- 41《倩女离魂》,郑光祖
- 42《陈抟高卧》,马致远
- 43《马陵道》
- 44《救孝子》,王仲文
- 45《黄梁梦》,马致远
- 46《扬州梦》,乔吉
- 47《王粲登楼》,郑光祖
- 48《昊天塔》,朱凯
- 49《鲁斋郎》,关汉卿
- 50《渔樵记》
- 51《青衫泪》,马致远
- 52《丽春堂》,王实甫
- 53《举案齐眉》
- 54《后庭花》,郑廷玉
- 55《范张鸡黍》,宫天挺
- 56《两世姻缘》,乔吉
- 57《赵礼让肥》,秦简夫
- 58《酷寒

亭》,杨显之,(花李郎)59《桃花女》,(王晔)60《竹叶舟》,范康 61《忍字记》,郑廷玉 62《红梨花》,张寿康 63《金安寿》(金童玉女),贾仲明 64《灰阑记》,李行道 65《冤家债主》66《信梅香》,郑光祖 67《单鞭夺槊》,尚仲贤 68《城南柳》,谷子敬 69《评范叔》,高文秀 70《梧桐叶》,(李唐宾)71《东坡梦》,吴昌龄 72《金钱池》,关汉卿 73《留鞋记》,曾瑞卿 74《气英布》75《隔江斗智》76《刘行首》,杨景贤 77《度柳翠》,(李寿卿)78《误入桃园》,王子一 79《魔合罗》,孟汉卿 80《盆儿鬼》81《对玉梳》,贾仲明 82《百花亭》83《竹坞听琴》,石子章 84《抢妆盒》85《赵氏孤儿》,纪君祥 86《窦娥冤》,关汉卿 87《李逵负荆》,康进之 88《萧淑兰》,贾仲明 89《连环记》90《罗李郎》,张国宾 91《看钱奴》,(郑廷玉)92《还牢末》,李致远 93《柳毅传书》,尚仲贤 94《货郎担》95《望江亭》,关汉卿 96《任风子》,马致远 97《碧桃花》98《张生煮海》,李好古 99《生金阁》,武汉臣 100《冯玉兰》101《双赴梦》,关汉卿 102《拜月亭》,关汉卿 103《裴度还带》,关汉卿(贾仲明)104《哭存孝》,关汉卿 105《单刀会》,关汉卿 106《绯衣梦》,关汉卿 107《诈妮子》,关汉卿 108《陈母教子》,关汉卿 109《五侯宴》,关汉卿 110《遇上皇》,高文秀 111《襄阳会》,高文秀 112《浣池会》,高文秀 113《金凤钗》,郑廷玉 114《东墙记》,白朴 115《圯桥进履》,李文蔚 116《蒋神灵应》,李文蔚 117《西厢记》,王实甫 118《破窟记》,王实甫 119《三夺塑》,尚仲贤 120《紫云亭》,石君宝 121《贬黄州》,费唐臣 122《贬夜郎》,王伯成 123《庄周梦》,史九敬先 124《一介子推》,秋君厚 125《东窗事犯》,孔文卿 126《降桑椹》,刘唐卿 127《七里滩》,宫天挺 128《周公摄政》,郑光祖 129《三战吕布》,郑光祖 130《智勇定齐》,郑光祖 131《伊尹耕莘》,郑光祖 132《老君堂》,郑光祖 133《追韩信》,金仁杰 134《存孝打虎》(雁门关),陈以仁 135《剪发待宾》,秦简夫 136《霍光鬼谏》,杨梓 137《豫让吞炭》,杨梓 138《敬德不服老》,杨梓 139《风云会》,罗贯中 140《西游记》,杨景贤 141《升仙梦》,贾仲明 142《替杀妻》143《小张屠》144《博望烧屯》145《千里独行》146《赤壁赋》147《云窗梦》148《独角牛》149《刘弘嫁婢》150《黄鹤楼》151《衣袄车》152《飞刀对箭》153《玩江亭》,戴善夫 154《村乐堂》155《延安府》156《黄花峪》157《猿听经》158《锁魔镜》159《蓝采和》160《符金锭》161《九世同居》162《谢柳垂丸》^①

索罗金的其他著译

弗·费·索罗金(1927—)现为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出生于萨马拉市,1950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0—1957年曾任教于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57—1967年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任职。1967年转入远东所。著译丰硕,至1993年统计,总数有171项。其研究工作有不少特点。

其一是研究的领域宽广。他早期研究的重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表过评论叶圣陶、老舍、叶紫、艾芜及其他现代作家的文章,翻译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老舍、郁达夫、艾芜、王统照、王愿坚、茹志鹃的中短篇小说。1958年即以专著《鲁迅世界观的形成(早期的政论作品〈呐喊〉)》成名。它从一个侧面,即鲁迅早期的活动和创作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论述作家早年政治观、哲学观和美学观的形成。是苏联汉学界的第一部鲁研专著。

接着又发表专著《茅盾的创作道路》(1962)。它不但是苏联,而且是中国国外的第一部论析茅盾作品的著作。书中全面介绍茅盾的生平与创作,从步入文坛直至1949年以后,即五十年代。描述茅盾早期的探索,分析他在二十年代初如何倾向于自然主义的艺术观。实际上奉行批判现实主义的原则,追述作家后来的发展道路,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创作,特别肯定茅盾的爱人民、爱祖国和民主主义的思想。

索罗金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转向开拓古典戏剧领域,特别是1964年到中国进修,得到著名戏曲史家周贻白的指导之后,花了二十年时间钻研,先后写出不少论文,终于形成论元曲的专著(1979)。

近年来又注重当代文学,编选《当代中国小说·王蒙、谌容、冯骥才》(1984)、《纪念》(1985,收入李准、王蒙、冯骥才、高晓声、蒋子龙、刘绍棠等人的短篇小说),为一系列当代小说或长中篇小说的俄译本作长篇序言。有的文章不仅论析个别作家和作品,而且对某个时期或某一体裁的创作作出综合分析。如《中国当代文学思潮》(1984)、《文学之镜反映出不断变化的现实》(1986)、《新阶段的中国文学》(1983)等。他和老汉学家艾德林(1909—1985)合写的《中国文学(简编)》(1962)则是一本自古迄今的中国文学简史。

其二是研究与翻译并重。在俄苏汉学界,有不少人或侧重于翻译,不写专著,甚至有译本要请别人作序,以便集中精力多译作品;有的人相反,注意力仅在于研究和评论,无暇顾及翻译。索罗金则两者并重。通观其著译目录,约有一半是翻译作品,不但有许多短篇,而且有若干长篇巨著,早的如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五十年代译),近的有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1990译)。翻译的体裁也很广,不但译当代的小说作品,而且译古典的戏曲、诗词。

其三是现实性强,具有见识广阔的学者常见的那种学术敏感性。索罗金从1948年到中国,在中长铁路实习开始,至1993年初统计,前后来华工作或访问已达18次,其中包括两次到台湾(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一次在台湾进行合作科研工作四个月,即1992年10月—1993年2月)。对中国有比较广泛和深入的了解。他对中国近年来的巨变和进步极表敬佩,认为反映这次变革的作品,无论长中篇小说,短篇或者剧本,都嫌不足,亦不易做到。如实报道改革中的成就、困难和曲折,以及人民群众的思想、复杂心态的,莫若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因而他在1989年和1992年先后编选(并参加部分翻译工作)《北京人》的选本和全本,并为之写出长篇序言,既评述中国的变化,又评论《北京人》这种报告文学的优越性,序中含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索罗金也是中国文化界所熟悉的俄国汉学家,今年已届七十高龄,在他近半个世纪的汉学研究和中俄文化交流的工作中业已作出巨大的成就,并为我国学界同行所承认。祝愿他健康长寿,在今后继续做出新的贡献。

1997年7月10日于北京大学